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元观*

纳日碧力戈 张梅胤

【摘要】中央高层不断强调新时代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我们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探索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发现新路径。本文从三元符号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探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知,指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皮尔士符号三元交融论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对立论,在兼容物感物觉的同时,更强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互相渗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形”“气”“神”缺一不可的观点,也在思想层面上与前涉符号三元观兼和,暗藏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年提出“大化三极”,贯穿“兼和通全”“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对立统一观,也可以归入本文的三元符号观。本文作者认为,利用这样的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新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元观;形气神

【作者】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梅胤,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2-0001-0007

一、刘安“形气神”三位论与张岱年“大化三极”

西汉刘安主持撰写《淮南子》,其“原道”一篇专门论及形气神: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许匡一译文:形体,是生命的住舍;气脉,是生命的支柱;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一旦它们失去了各自的地位作用,就会被伤损。因此圣人总是让它们各处在应有的地位上,各司自己的职守,而不让它们互相干犯。所以,形体如果处在不安宁的环境就会伤残;气脉如果运行不畅使用不当会泄失;精神如果用得不恰当就会昏聩。……所以以神为主宰,形依从神,对生命便有利;以形为制约,神依从形,对生命便有害。)[1]47~50

如刘安所说,天下生物,包括昆虫和爬虫,都知道趋利避害,因为它们的形神没有分离,形神分离会导致它们骨肉无形;人类能够目光深远,耳听八方,身体抗重,各个关节能够屈伸自如,明察黑白,靠智慧辨别异同、是非,都依靠气脉支撑、精神主宰生命。一旦精神失去主宰,人的五官就对外界事物失去了感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小失大、顾上不顾下、顾里不顾外、顾左不顾右。[1]48

*基金项目:甘肃省委委托河西学院项目“河西走廊民族团结和历史文化研究”(H2020027)。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道不以二终，必以三全；道“不漏声色”，却遍布声色之中。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形态各异，变化无限；物物相指，千灯互照，万象共生；“八音合奏”，“大德敦化”，万变有宗。道能够以心通物、以心联物，在传通和关联中生出和统制万物万象。大道生生不息，“形舍”“气充”“神制”三融为一，道潜其中。这种三融为一的思想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元思维、元宇宙观，和皮尔士符号思想在哲学—符号学层面上相合相应。

“形气神”三位论是不走捷径、不图省力的三元交融论，它不把形神对立起来，不因追求简单、静止、可控而把气脉排除在外，而是充分考虑到事物、现象及其认知的复杂性、开放性，让形气神各守其位，互补取代，避免“三者皆伤”，避免“形废”“气泄”“神昧”。下面我们会看到，在抽象层面上，刘安的形气神三位可以大致对应于皮尔士的征象、对象、释象，其中征象可解释为“物感物觉”，对象可解释为“物物相指”，释象可解释为“象征意义”。

哲学家张岱年也从不同角度提出“大化三极”说：宇宙大化有“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一元极指“最根本的物质存在”，二理极指“最根本的原理”^①，三至极指“最高的价值准则”；最根本的物质存在是“最究竟的”物质基本粒子，原子和电子构成一般物体，基本粒子又构成原子和电子，“最究竟的基本粒子”虽不可再分，“然仍可分析为不同方面”；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是对立统一，但凡事物，“莫非两一”“物莫不两，两莫不一”“生生之谓易”“阴阳对立而统一”；最高的价值准则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即“兼和”“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兼富而一纯，实为价值之最高准则”“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2]220}

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直所从言之异尔。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3]203}

无论刘安的“形气神”三位，还是张岱年的“大化三极”，或是古人的“三生无限”，都秉持“尚三”的理念，都含有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的要素，都讲究三不缺一、三元交融，都强调具象与抽象的活态关联，以一摄多，以多拥一，一以贯之。

二、皮尔士三元符号论

皮尔士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三元符号论的承上启下者^②，他认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符号性的（all thought is in signs）”^{[4]628}，而且人本身就是符号：“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符号，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符号。”^{[5]135}类似于后来格尔兹强调意义的公共性^③，皮尔士指出思想外在于我们，而不是内在于我们，与其说我们在思考、思想内在于我们，不如说我们在思想里，思想通过我们得到发展。^{[5]138-139}顺着这条思路，我们是思想的工具。皮尔士这个说法的根据是符号三性论^④，思想属于第三性，而第三性离不开第一性和第二性，它们互为条件，交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更准确地说，象征意义离不开物感物觉和物物相指，思想不完全是内在的，也不完全是外在的，而是内外交融、开放互动的过程，就像 semiosis 可以翻译成“符号活动”，也可以翻译成“符号过程”。

① 根据皮尔士符号理论，符号三性关系中的“第二类”（the second class of triadic relations）属于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the laws of nature），如质量（mass）、动力（momentum）、能量（energy）；“第三类”（Interpretant，释象）由符号（signs）和自然规律共同构成。参见 John Peirce, *Tractatus de Signis* (The Semiotic of John Peirce, Corrected Second Edition), Interpretive Arrangement by John Deely,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13, p. 495.

② John Deely, Augustine & Peirce: The Protosemiotic Development, Rationale of The Trilogy, Scranton, PA & London: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p. vi.

③ 格尔兹指出，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如果不懂什么是眨眼示意或如何抽动眼皮，就不能眨眼示意（或谐谑）；不懂什么是盗羊或如何盗羊，就不懂什么是抢羊（或模拟抢羊）。当然，不能因此就说，懂得如何眨眼示意等于眨眼示意，或懂得如何抢羊等于抢羊。（参见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④ 我们在下面会简要介绍“符号三性”。

皮尔士把符号 (sign) 分为三类: ①征象 (representamen)、对象 (object)、释象 (interpretant); 其中对象又分为三类: ②象似 (icon)、标指 (index)、象征 (symbol)。③征象和象似属于物感物觉; 对象和标指属于物物相指; 释象和象征属于象征意义。按照皮尔士的定义, 征象是第一, 它和第二, 即对象, 有真实的三维关系, 并由此决定了第三即释象的存在, 使释象也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 征象、对象和释象保持“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6]32}征象、对象、释象构成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连续统; 象似、标指、象征也同样构成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连续统, 由可能性过渡到思辨性, 具有“兼和相济”、三元一体的特质。

为了便于说明符号三元论和“形气神”三位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仅选用皮氏符号论的对象三分: 对象一为象似, 与其所指构成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关系, 如拟声词、照片、地图、设计图等, 如我的照片和我本人的关系, 中国地图和中国领土范围的关系; 对象二为标指, 与其所指并不构成一致性或相似性关系, 但构成连续性关系或逻辑性关系, 如烟与火的关系, 由烟知火, 由火推烟; 对象三为象征, 与其所指不构成连续性或逻辑性关系, 也不构成一致性或相似性关系, 而是构成语言学上的约定俗成关系, 例如汉语“树”和具体树木的关系。总的说来, 象似符号具有“原料”“质料”“质感”“物感物觉”的特性, 但也包含标指和象征的可能性; 标指符号具有“一叶知秋”“举一反三”“由甲推乙”的性质, 但也包含象似和象征的可能性; 象征符号具有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的性质, 但也包含象似和标准的可能性。

三元一体、三元交融、“生生不息”的哲理, 可以举交通灯为例: ④司机和行人会遇到红色扑面而来, 带有一种粗朴之力; 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红色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来了, “红灯停”; 几乎同时, 那隐蔽在交通信号灯背后的“交通文化”也在背后运作起来, 例如闯红灯要罚款、扣分, 红灯亮起时, 是否可以右转弯, 非机动车和行人是否怀有“法不制众”的心态, 置红灯于不顾, 等等。

总之, 按照皮尔士的想法, 符号三性能够兼顾“物”与“心”, 实现符号革命, 打通唯心和唯物物的区隔, 让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同时在场, 颇有形气神整体论古风。

三、在三元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共确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汉族占总人口的 91%, 是主体民族,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18 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由于人口流动、驻军屯田、移民实边、灾荒兵燹等原因, 各族人民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互嵌杂居的人口分布, 生活在山林、沿海、高山、戈壁、草原等不同的地理环境中, 在经济文化上互补相依, 尤其是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互补性最强, 经济交流也最频繁。

① 亦称“三性”: “第一性” (firstness) “第二性” (secondness) “第三性” (thirdness)。

② 由于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人类学多选用其中比较易于把握的对象三分, 对征象三分和释象三分较少涉及。

③ 目前大陆学者对皮尔士符号学的译名尚未达成一致。例如, 郝长堃将 representamen 译为“表象”, object 译为“对象”, interpretant 译为“解释者”; 把“对象”三分中的 icon 译为“肖像”, index 译为“指向”, symbol 译为“记号”。(参见科尼利斯·瓦尔著, 郝长堃译:《皮尔士》, 中华书局, 2014 年第二版, 第 114~127 页) 又如, 丁尔苏、赵星植将 representamen 译为“再现体”, object 译为“对象”, interpretant 译为“解释项”; icon 译为“像似符”, index 译为“指示符”, symbol 译为“规约符”。(参见丁尔苏:《符号与意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3~66 页。皮尔斯、李斯卡著, 赵星植译:《皮尔斯: 论符号》《李斯卡: 皮尔斯符号学导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80~286 页) 丁尔苏也将 icon 译为“类象符号”(采用威雨村《语言学百科词典》的译法), index 译为“引得符号”, symbol 译为“常规符号”。(参见丁尔苏:《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39 页)

④ 如果我们能够以“慢镜头”人为分解司机和行人对交通灯的辨识, 当然也可以借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指为了正当对待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或组织成员, 根据最理想的方式, 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背后, 约定好在走出这个幕布之后, 谁都“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 他们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参见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31~136 页)

多少年来,中原文化向周边辐射,尤其是儒学思想和汉字文化被周边各族人民吸收和使用,为培育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心理和实践的基础。同时,周边各族人群的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如“胡服骑射”对汉族服饰形制的决定性影响,塞北声调和乐器对中原音乐产生了极大影响,传入汉地的“胡部”类乐器多达数十种,如笛子、琵琶、箜篌、胡琴、铜钹、腰鼓,等等。

又如,我国的56个民族使用130种以上的语言,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加强凝聚力,不断加强对伟大祖国和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丰富多彩,有利于互鉴互用,兼和相济,和合共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丰富多彩、交往交流交融之中,潜藏着各族人民彼此认同的神韵,发展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势能。形态表象多样、物感物觉丰富并不阻碍神制意统、重叠共识,因为气充势能、物物相指将形与神、物感物觉与象征意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气神是三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是三元,三元交融一体,相互协调,互为条件,各守其位,掌握好和习惯于这样的认知,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处理好“多”和“一”、差异和同一的复杂关系,有利于避免错位处理民族关系,有利于避免问题入侵,有利于避免一厢情愿,有利于避免走极端、扩大化。

不能把形物层面混同于精神层面,不能无视气脉,造成形废神昧;不能罔顾物物相指,造成物感物觉与象征意义脱节。举例来说,在形物层面上,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丰富多彩,互补共生;在气脉和物物相指的层面上,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互鉴互用;在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已经从单一的方便族际交往交流、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工具,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核心象征,是共同体凝聚力的关键符号。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全国通用语言文字是祖国认同、共同体认同的象征,属于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是地方生活的交流工具,属于形物和物感物觉的层面。当然,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也是交流工具,但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出发,它更属于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具有强大的象征力和凝聚力。所以,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和凝聚的象征,^①各族人民有义务学习掌握它,提高祖国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质量。正因为如此,推广普及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和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并不互相矛盾,二者是兼容和包容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共同性是目标,属于神韵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差异性是要素,是动力,属于形物和物感物觉的层面。气脉和物物相指把形物、物感物觉和神韵、象征意义紧紧联系在一起,交融一体,形神不离,物心不二。

再举一例。按照官方表述,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只有根深干壮,才能枝叶繁茂。“主干”之喻属于神韵、象征意义层面,“枝叶”之比属于形物、物感物觉层面,“主干”是“枝叶”的递进和升华,是凝聚的象征,是认同的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把“主干”和“枝叶”分开,不能只管“主干”,不管“枝叶”,或者只管“枝叶”,不管“主干”,一句话,形神不能分开,物感物觉和象征意义不能分开。

表一：“形气神”“象似—标指—象征”“大化三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神(抽象)	象征(物感物觉)	最高的价值准则	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
气(交流)	标指(物物相指)	最根本的原理	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
形(具象)	象似(象征意义)	最根本的物质存在	各族文化丰富多彩

^① 可以称之为全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各族人民的交流工具,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核心象征。

前些年,有一种话语流行,把少数民族当“累赘”,^①把少数民族文化归入“异类”,这显然是形气神错位、象似、标指、象征失序的认知。“一失其位,三者皆伤”,这条古训不可忘记,也不能忘记。不同文化人群、不同语言文化本身并不构成“累赘”,更谈不上“隐患”或“威胁”,这样的“累赘”“隐患”“威胁”来自想象,来自前述认知上的形气神错位和象似、标指、象征失序。大千世界原本丰富多彩,宇宙万物原本自然和谐,把丰富多彩和自然和谐对立起来,把差异性和统一性对立起来,既不符合辩证法规律,也不符合生活常识,更不符合伦理道德。

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共同性是“神”“释象”“象征”;多样性是“形”“对象”“象似”。在形物层面上,或者说在“对象”“象似”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文化人群^②多种多样,不同的地方历史造就了不同的地方文化人群,不同的地理环境培育出不同的风俗习惯,北京话、广东话、上海话、山西话、蒙古语、柯尔克孜语、苗语、侗语、佯语、布朗语等方言和语言,各有特色,百花齐放;北方人有爱吃面的传统,南方人有爱吃米的传统,农耕文化、牧业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渔猎文化各有千秋、美美与共。在精神层面上,或者说在“释象”“象征”层面上,有“四个共同”: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7]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中华民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继承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文化,各族人民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增加共同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他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8]17}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自在”属于物感物觉和形物的层面,其“自觉”则属于象征意义和精神的层面,各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属于物物相指和气脉的层面,“三交”将物感物觉和形物的层面和象征意义和精神的层面关联在一起,互不分离,以强大的势能推动互联互通,不断发展和升华。

在“气脉”层面上,亦即“对象”“标指”层面上,神州大地上的各族人群自古保持交往交流交融,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局部现象。苏秉琦先生以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出发,将田野工作和理论探索结合起来,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论,努力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9]2},证明文明源头如何交汇在一起,组成当代中华文明共同体。“满天星斗”论注重关联,物物相指,由形物推精神,影响深远,历久弥新。

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9]9}

“中华”大约出现在魏晋时期,其古义相当于“中国”。^{[10]1}“中华”由“中国”“华夏”“诸夏”“诸华”衍生出来,“夏”表示“大”,“华”表示“服章之美”。概括说来,“中华”含义有三:一指中原和王朝直辖的郡县地区;二指汉人;三指中原文化。^{[10]1~2}根据王树声的观点,“中华”一词最初用于天文,由“中国”和“华夏”各取一字组合而成。^{[8]213}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中国古今各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8]221}。

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交通便利,人流不断,物流不断,图像爆满,信息爆炸,快餐快递,“迅捷”“迅雷”“四通”“5G”“六全”“七度”“八核”“九级”,各种品牌,各

① 孙雁在《领导者》杂志2011年4月刊发表《“累赘”还是隐患?——评估中国族群问题的危机度》一文颇具代表性。该作者认为,引用“西方学界的研究”,认为“文化和语言意识也是培养雏形国家增强其能力和分裂动机的一大因素”“联邦制机制都结构性地制造了分裂主义的动力”“自治行政区内少数民族(民族)的人口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的区域更容易发生分裂”,其结论是:“族群问题对中国的将是持续的低度危机或‘累赘’,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是高度危机或‘隐患’。”

② 不仅包括少数民族,也包括各族内部的支系和地域人群。

类服务,无数渠道,让人目不暇接,喘不上气。在此新时代背景下,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更加密不可分;形气神职守更加关联一体;“兼和通全”“复又日新而一以贯之”。新时代是我国各族人民全面而迅捷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各个现代国家内部的共同体意识,虽然信息、图像、货币、商品、人流、灾害、疫情等等可以超越国界,但国界在抗灾抗疫中变得更加巩固,国际合作反而会强化国界,国际交流提高了各国的总体安全观。从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角度,从形气神兼顾的视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四、余论

万物生长、万象共生皆以“三”取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三为至数。《淮南子》讲精神主宰,形物依从,形气神各守其位,不可缺失;皮尔士讲属于第三性的释象(思想),离不开第一性的征象和第二性的对象,它们互为条件,交融一体。张岱年提出的“大化三极”,也与刘安、皮尔士的观点有重合之处:“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离不开“形”,也离不开“物感物觉”;“最根本的原理”与“气”暗合,与“物物相指”相近;“最高的价值准则”与“神”相通,与“象征意义”相连。

表二:“形气神”论、符号三元论、“大化三极”论的重叠

“形气神”	“大化三极”	符号三元论
“形舍”“气充”“神制”各守其位,“一失其位,则三者伤矣。”“形气神”三合为一,神为主宰,形为依从,气为关联。	元极是“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是“最根本的原理”,至极是“最高的价值准则”。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是对立统一,“生生谓之易”,最高的价值准则是兼和,“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思想外在于我,而不是内在于我;思想属于第三性,而第三性离不开第一性和第二性,它们互为条件,交融一体。第一性是物感物觉,第二性是物物相指,第三性是象征意义。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日新月异,现代化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现代化也带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大,空气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疫情肆虐,道德滑坡,认同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负面现象大多数是由“三元失位”造成的:片面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品质,忘记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抛弃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一失其位,三者皆伤矣”!皮尔士讲,思想外在于而非内在于我们,虽然一般说来,思想是内外结合的过程,但从思想是社会性的、建立在物物相指的物质性基础之上这个角度上看,此说不谬。格尔兹也秉持类似于“思想外在于我们”的观点,他在批评一位认知人类学者时所说,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它不存在于人脑中。^{[11]14}当然,我们的符号活动不是超自然的,文化观念即便是非物质性的,也要以形物为基础,符号活动中的发音、颜料、笔画、音乐,都具有重要意义。^{[11]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借鉴上面讨论的三元论,确保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不失其位、各守其职;避免因符号活动失序带来的“形废”“气泄”“神昧”;拒绝把“最根本的物质存在”“最根本的原理”“最高的价值准则”对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属于“最高的价值准则”,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属于“神制”;各族各地的语言方言、风俗习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餐饮服饰等等,属于“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物感物觉”“形舍”;各个族群人群自古交往交流交融属于“最根本的原理”,“物物相指”“气充”。这三个方面既不可分割,亦不可混淆,各有其用,各司其职,关联一体。不能把精神层面的要素混同于物质层面的要素,也不能让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脱离交往交流交融,造成“气泄”无用,导致精神层面的“神昧”和物质层面的“形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和合有韵,不失偏颇,重在交融,重在相济,不在同化,不在对立;重在摆好“主干”和“枝叶”的位置,让“根深干壮”和“枝叶繁茂”互为条件,不在以“主干”取代“枝叶”,更不在以“枝叶”去掉“主干”——无论从哲理还是道理上说,这样的做法不可能行得通。爱人、爱家、爱乡、爱国层层递进,土话土语、方言族语、通用语文步步升级,其间并无截然对立的必要,唯有和谐共生的现实。同样,不能把生物多样和宇宙大道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丰富多彩和普遍规律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表述: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少数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以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准确、完整把握其重要意义,是一条守正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国内外可用理论、符合时代要求的广阔路径。

参考文献:

- [1] [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全译:上[M].许匡一,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2] 张岱年.“大化三极”:张岱年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3] 张岱年.“品德论”:张岱年全集(第三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4] John Deely.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the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 [5] [美]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M].郝长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 [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7]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OL].(2019-09-27)[2022-01-27].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024.htm.
- [8]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 [9] 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M].赵汀阳,王星,选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10] 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1]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A TRINITY VIEW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Naran Bilik, Zhang Meiyin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onstantly emphasize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calling on to build on the past, innovate, explore new theories, develop new methods, and discover new path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cogni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nary symbol theory and its related ideas, and points out the feasi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blending of the physical sensation, physical appearance, the sense of things, the signification of things,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to consolidate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Peirce's ternary fusion theory of symbols is different from Saussure's theory of binary opposition of symbols. When it compatible with physical sensation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it also emphasizes the inter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physical sensation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object and physical reference, and symbolic meaning at the same time. What's more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view that "Body", "Qi" and "Spirit" are indispensable is also compatible with the previous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symbols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and there are hidden similarities. The philosopher ZHANG Dainia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ree poles of maximization", which run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is "harmonious and comprehensive" and "rich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a feasible new path to use such living triadic cognition and practice to consolidate the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Trinity View; the Body, Qi and Spirit

〔责任编辑: 俸代瑜〕